

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意识形态建构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

杨 丽, 耿宪兵

(新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 乡村意识形态建构是中国共产党乡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逐渐为乡村民众认可的政治过程。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意识形态建构历经了孕育开启、曲折探索、恢复调试和赓续完善等发展阶段。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意识形态建构的百年经验, 深刻阐释乡村意识形态建构的根本遵循、中心议题、组织保障、价值立场、内在要求和有效途径, 对建构起更富有价值引领性和现实针对性的乡村意识形态和全面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意识形态建构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 乡村社会; 意识形态建构; 百年历程; 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3114(2021)06-0004-07

近代以来, 中国以农业国身份被动卷入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 乡村社会却因战乱破坏和西方思潮冲击而日益衰落, 传统的乡村意识形态解体, 农民意识形态认同陷入迷茫失序窘境。为摆脱乡村社会困境, 社会各阶层开展了以现代新思想为引领的乡村建设运动, 但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来完成建构乡村意识形态的使命任务。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融入中国乡土社会, 通过对乡村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层次、全方位建构, 成功地将不同议题设置、理论回应、话语阐释的意识形态寓于乡村社会之中, 赢得了乡村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政治认同,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意识形态建构道路。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意识形态建构的百年历程, 探寻其中蕴含的历史规律, 可为新时代的乡村意识形态建构提供经验借鉴。

一、当前学界的相关研究进展

“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 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 意识形态建构问题始终是学者们所关注的重要理论和现实课题。百年乡村变革是近现代中国发展的历史缩影, 在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嬗变中, 乡村意识形态建构问题呈现出多样化的演进特征, 为学者留下了广阔的研究场域。

(一) 关于乡村意识形态的建构理路研究

学界关于乡村意识形态建构理路的研究以“国家行政建构”和“乡村自我重塑”两种分析视角为代表。“国家行政建构”的研究者从行政力量主导视角出发, 分析国家在乡村社会中强制建构特定思想价值体系的过程和实现“外部管控和主导型的乡村秩序被建立起来, 整个乡村秩序成为国家秩序同质化的组成部分”的目的^[2]。“乡村自我重塑”的研究者从乡村发展内在逻辑出发, 提出传统秩序是乡村社会中人们基于长期的交往和磨合而自发形成的一套共识, 因为是内生的共识, 所以能够很好地被大家所遵守, 并内化为人们自觉的行为准则。因此, 他们主张“不盲目地引入外来力量、移植外来规则, 而是乡

[收稿日期] 2021-06-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BKS098)

[作者简介] 杨丽(1964—), 女, 陕西岐山人,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 邮箱: 2104153767@qq.com; 耿宪兵(1993—), 男, 河南杞县人,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土社会秩序本身的重建”^[3]。

(二) 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意识形态的建构历程探究

当前学界对中国共产党建构乡村意识形态历程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不同时期的实践展开分析。其中“革命时期”的研究者围绕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教育,将这一时期的建设实践归结为革命性意识形态的建构^[4]。“建设时期”的研究者以“解放”与“翻身”为出发点,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形塑乡村新主人的乡村意识形态建设实践活动^[5]。“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研究者着重分析中国共产党将改革性意识形态融入乡村社会的历史过程^[6]。“新时代”的研究者从突破现实困境出发,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促进乡村文化繁荣发展,丰富乡村特色的话语体系^[7]。也有学者从乡村现代化的整体视角出发,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意识形态建构成功整合了乡村资源,革新了乡村传统思想文化面貌,并以先进意识形态重新构建了乡村的思想文化秩序^[8]。

目前学界关于乡村意识形态建构问题已有一定探究,但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对其关注度还比较低,尤其是立足大历史观视角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因此有必要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建设的百年历史出发,探寻乡村意识形态建构的内在逻辑,总结经验教训,以资鉴当下。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意识形态建构的百年历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意识形态建构的百年历程历经了孕育开启、曲折探索、恢复调试和赓续完善等发展阶段。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乡村意识形态建构逻辑,牢牢掌握乡村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凝聚起改造乡村、建设乡村、改革乡村和振兴乡村的强大政治共识,加快了乡村社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一) 在革命斗争中孕育开启乡村意识形态建构(1921—1949年)

中国共产党在以农民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中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首要需要解决如何组织动员乡村民众支持参与革命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引入乡村社会,以阶级意识启蒙民众革命自觉,成功将“革命话语”植入乡村民众头脑,实现了对乡村意识形态的重塑。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革命成功与乡村民众政治觉醒之间的必然逻辑关系。革命初期,毛泽东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教训时就提出国民革命成功“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9]。为在乡村开展组织化的革命理论教育,中国共产党创办农协和农工会等组织,1925年成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并以“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鼓动乡村贫苦民众参加革命^[4]。进入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以红色根据地建设为中心开展更为深入的意识形态建构。在1934年全国苏维埃第二次大会上,毛泽东强调要在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中突出培养农民阶级意识^[10]。军队是中国共产党建构乡村意识形态的重要力量。长征期间,中国工农红军充分发挥宣言书、播种机和宣传队作用,在途经的西部偏远乡村散播革命思想,引领劳苦大众“翻身闹革命”。1937年后,中国共产党将解决民族矛盾作为乡村意识形态建构的重点,在广大的乡村地区以识字运动、歌咏运动、戏剧运动等形式开展民众抗日教育。在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利用农民劳动模范开展政治教育活动。在延安整风运动的背景下,各根据地组织工作队到乡村社会访贫问苦,帮助农民算阶级剥削账,坚定农民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开展“谁养活谁”的问题教育运动,以诉苦追根方式引导农民认清阶级仇恨,启发农民阶级觉悟,激发农民的阶级意识和革命热情,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二) 在全国执政背景下曲折探索乡村意识形态建构(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为巩固乡村社会中新生的人民政权,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以群众运动为意识形态建构主要形式,着重培养乡村民众的阶级意识、集体意识和社会主义意识,开启了全国执政背景下的乡村意识形态建构历程。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从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角度,在乡村社会开展了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在乡村社会面貌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

移风易俗,大力革除残存的封建陋习,将社会主义新风尚带到乡村社会中。针对土地改革后,局部乡村地区出现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毛泽东强调做宣传工作的同志要向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生动的政治教育^[11]。1954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提出要健全乡村宣传教育网络,在乡村地区深入系统性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以便为乡村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准备思想条件^[12]。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为增强农民的集体意识,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社会开展“忆苦思甜”教育活动,通过新旧社会生活的差异化对比,引导乡村民众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乡村民众坚定走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道路的政治共识。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乡村社会的普遍建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乡村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中国共产党充分运用社会主义建设中诞生的先进精神和涌现的乡村民众进步典型,开展社会主义乡村意识形态建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诞生的雷锋精神、大寨精神和红旗渠精神等都成为建构乡村意识形态的鲜活教材。尤其从1964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社会中开展了深入持久的学习大寨精神教育实践活动,极大地鼓舞了乡村民众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热情。1957年后,中国共产党各项工作日益受到“左”倾思想干扰束缚,尤其是“文革”期间,乡村意识形态建构陷入表面热闹而实质萧条的境地。

(三)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恢复调试乡村意识形态建构(1978—2012年)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强调意识形态建构的价值合理性转向更突出执政成就的实效性,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乡村社会意识形态建构的政治红线,以经济发展成绩来增强意识形态建构的可信服性,强化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在乡村社会的政治引领力,顺利实现了乡村意识形态的恢复重构。但随着市场经济在乡村社会的发展,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开始活跃,中国共产党的乡村社会意识形态建构在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调试中探索发展。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乡村意识形态领域的拨乱反正,恢复乡村社会的政治社会秩序,同时将蕴含改革话语的意识形态寓于乡村社会中,引领乡村民众参与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针对乡村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社会继续强化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农民自觉抵制落后腐朽的封建思想以及资本主义思想侵蚀^[13]。与乡村社会的生产关系变动相适应,乡村原有政社合一管理体制发生变革,村民自治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意识形态建构的新方式。2005年党和国家开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后,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意识形态建构更加重视满足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同年12月出台的《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要强化乡村社会中的形势政策教育工作,深入实施群众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提升乡村民众的思想道德水平^[14]。为克服市场经济对乡村意识形态建构的负面影响,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扎实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农村党员、教育农民群众。”^[15]2011年2月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意见》也强调提高农民文明程度,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中弘扬新风尚,进一步拓展乡村文化的发展空间^[16]。

(四) 在新时代赓续完善乡村意识形态建构(2012年以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为迫切,乡村社会的精神文化样态呈现新特征,乡村意识形态建构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实施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在乡村社会中耦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等活动,开展了富有成效的乡村意识形态建构活动。在新时代建构乡村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就反复强调“农村要遵循自身发展规律,不能忘记乡愁,不能丢掉农村的历史和传统”^[17]。新时代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乡村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内容,2015年1月印发的《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要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主题,考虑乡村文化建设的特殊性,在乡村社会中开展更有针对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活动^[18]。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乡村网络意识形态

阵地建设,一方面不断加强乡村社会网络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推动社会主旋律文化占领乡村网络意识形态阵地。随着乡村振兴成为乡村社会发展的实践主题,乡村振兴话语建设成为意识形态建构重要内容。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从乡村振兴角度提出通过深化乡村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集体教育,不断巩固和加强乡村思想文化阵地建设^[19]。2019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也强调要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渠道,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宣传教育,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去占领乡村思想文化阵地^[20]。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经验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开展乡村社会意识形态建构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乡村社会政治共识以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法宝,全面总结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经验,可为应对当前乡村意识形态建构中面临的风险挑战提供有益借鉴。

(一)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建构乡村意识形态的根本遵循

马克思主义因其理论上的彻底性,而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和掌握革命群众的重要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21]。这一新论断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历史经验对新时代意识形态斗争变局的准确回应。中国共产党的乡村社会意识形态斗争历程表明,如果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乡村意识形态建构中的指导地位,就失去了意识形态建构的政治先进性,在深层次上模糊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同其他意识形态的阶级界限,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社会意识形态建构的实践活动就失去了历史合法性依据。始终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理论区别于其他虚假意识形态的鲜明特征,更是在与各种错误意识形态斗争中永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政治本色的根本遵循。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科学理论给养,更是方法论指导。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为指导,通过乡村社会阶级成分划分,冲破了乡村固有意识形态束缚,引领乡村民众找到摆脱自身思想困境的意识形态建构正确道路。在建设和改革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为指导,领导乡村社会民众实现“翻身”当家做主人。在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理论引领下,乡村精神文化得到飞跃式发展。在中国共产党乡村意识形态建构实践不断深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在乡村精神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也日益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乡村意识形态建构实践中充分显现其革命性,在带领乡村社会迈向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中充分彰显其真理性。因此,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意识形态建构才能拥有更为强大的理论说服力和现实斗争性。

(二) 服务同期历史任务是建构乡村意识形态的中心议题

意识形态作为思想观念上层建筑,对社会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反作用,建构起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意识形态,有助于促进同时期的社会历史发展。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从乡村社会所处的具体历史场景出发,以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为中心议题,在乡村社会中建构起了符合历史发展需求的意识形态,实现了乡村社会与国家历史演进的同频共振。为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在“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深入实践中,顺利建构起了革命性话语的乡村意识形态,成功地动员和领导乡村民众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中国共产党围绕国家建设任务,通过在乡村社会开展阶级教育、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成功将乡村民众力量凝聚到社会主义探索建设之中,在乡村社会建构起了与实现国强民富相适应的建设性乡村意识形态。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旗帜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社会积极建构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意识形态,领导乡村民众开启改革发展之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乡村社会的意识形态工作,建构起了与同期脱贫攻坚行动和乡村振兴战略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实现了乡村意识形态建构的创新发展。历史表明,乡村意

意识形态的建构不是孤立静止的过程,它与国家整体建设发展进程紧密关联,同时又具有自身特殊性。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意识形态建构既是在思想上对同期历史实践的能动反映,同时也有力推动了乡村社会建设和国家整体发展。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界定乡村社会意识形态建构议题,实现了对乡村意识形态发展方向的正确引领。

(三) 建强乡村党组织是建构乡村意识形态的组织保障

毛泽东在建党之初就强调“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9]。重视组织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乡村意识形态建构中始终重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充分发挥其在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教育乡村民众中的重要作用。党组织是意识形态的重要传播源。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意识到基层组织是“唤起工农千百万”的关键。为此,在革命斗争中积极推动政党下乡,通过在乡村地区积极创办进步组织和正式党组织,积极吸纳具有较高政治觉悟的农民加入共产党,以实现在党内对农民的意识形态教育,同时积极推动入党的农民返回乡村社会中发展新生组织力量,从而使得中国共产党组织顺利嵌入相对封闭的乡村社会,实现先进意识形态的外部有效介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在乡土社会的普及。同时,基层党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建构乡村意识形态活动的具体实践者,党组织的运行状态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能否得到普通乡村民众的自觉认同,“软弱涣散”的乡村党组织无疑会伤害党与人民群众的政治联系,损害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可能使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乡村党组织建设成效是乡村意识形态建构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乡村党组织建设。2021年4月颁布的《乡村振兴促进法》就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要按照党章和有关规定发挥全面领导作用^[22]。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乡村意识形态建构的百年历程中,推动乡村党组织完成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转变,实现了对乡村社会思想文化的示范引领,并以先进性政党形象赢得了乡村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自觉遵循。

(四) 契合农民利益需求是建构乡村意识形态的价值立场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领导乡村意识形态建构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何得到实现、维护和发展作为价值导向,依靠务实的行动回应民众现实关切,赢得了乡村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衷心认可。在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将维护农民实际利益需要作为建构乡村意识形态的行动旨归,以对乡村现实问题的解决,获取农民对中国共产党政策主张的自觉遵循。在建构工作之初,中国共产党便充分考察乡村民众苦难生活的历史和现实境遇,深刻认识到政治理念若未能满足农民生存和发展需求,将难以获取民众真正支持和拥护。为此,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坚守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为要求,将实现乡村民众利益需求作为方向,依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来回应乡村民众的现实利益需求,推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在更深程度上为民众所认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社会访贫问苦,以解决土地问题为突破口,完成乡村社会的阶级划分。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社会主义先进意识形态对乡村落后精神文化面貌的改造进程加快,通过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乡村民众社会政治地位提升,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氛围中,乡村民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权益真正实现。改革开放初期,面对乡村民众对意识形态建构的质疑,中国共产党通过推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不断满足乡村民众物质文化需要,以执政绩效彰显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价值性,实现了乡村意识形态建构的恢复重塑。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积极响应乡村民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将乡村民众汇聚于实现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百年历程表明,作为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集合的意识形态,只有契合乡村民众的实际利益需求,才能从思想深处获取乡村民众的衷心认同。

(五) 丰富内容表达是建构乡村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

乡村民众的接受认可程度与中国共产党所建构的意识形态样态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建构起与乡村社会实际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教育内容,才能真正实现政治引领目的。在与乡村社会多样思想文化长期

实践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规范包容和大众化表达的乡村意识形态建构内容,实现了不同背景下党的意识形态对乡村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嵌构。多样化的乡村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对中国共产党的建构活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百年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以辩证否定的包容性态度看待其他思想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借助其他文化形式开展意识形态建构工作,顺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由外力嵌入到内部引领的转变。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就在实践摸索中形成了如何在建构乡村意识形态中批判吸收其他思想文化的理性认识。中国共产党海陆丰农民运动领导人澎湃就提出,革命运动从基层发动,不能摆出高贵的架子,和农村妇女绝不谈新思潮,先不要谈迷信问题,之所以参加群众拜观音,是便于取得和群众的联系^[2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乡村意识形态建构中的作用,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实现了对乡村意识形态建构资源的更高层次整合。随着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水平不断提升,乡村意识形态建构内容更加重视规范化和法治化建设,乡村意识形态工作机制更加健全。在乡村意识形态建构活动的实际运行中,因建构对象受教育水平较低,乡村意识形态建构内容就要易于为民众所理解。为此,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乡村意识形态建构内容的大众化表达。比如“打到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不分姓氏地方,只分穷人和富人”、“社会主义好”等通俗化的政治号召,以鲜明性和带有冲击力的语言特色,更利于实现对乡村意识形态工作对象的心理和思想引领,从而推动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深入人心。因此,丰富意识形态内容表达成为提升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水平的内在要求。

(六) 灵活多样教育方式是建构乡村意识形态的有效途径

依据时代发展变化,推进乡村社会意识形态建构方式创新,才能更有效地实现对乡村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从而牢牢掌握乡村意识形态建构的主导权。意识形态建构方式的适当性直接关系到建构过程被乡村民众深层次接受认可的程度,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如何有效实现对乡村政治思想文化的持续引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构乡村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着力点。百年间中国共产党依靠长期实践探索,形成了灵活多样的意识形态建构途径,顺利有效地达到了向乡村民众“灌输”不同类型意识形态的目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革命发展实际,积极利用夜校、识字班等形式对乡村民众进行革命理论教育,以红色歌谣传唱、话剧表演等形式在乡村地区传播革命意识形态^[24]。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更重视建构乡村意识形态的方式方法创新运用。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完善乡村共青团、妇女联合会等群团组织,以此在乡村社会中开展不同类型群体的组织化教育;另一方面,借助报纸、广播、电视等现代传播媒介,开展更为普及的意识形态教育。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意识形态建构途径随外界社会环境发展而不断丰富更新,基本适应了乡村民众的认知心理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构建了以网络新媒体为主的全方位宣传教育方式,实现了乡村意识形态建构途径的与时俱进,乡村意识形态建构活动更加丰富有效。灵活多样的意识形态建构方式适应了乡村意识形态建构对象差异化状况,弥合了党和国家的政治意志与乡村民众认知之间的传递界距,依托全方位和立体化的意识形态建构方式,实现了乡村社会意识形态教育的全覆盖,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对乡村民众的意识形态价值引领,有力维护了党的意识形态在乡村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这是我们党在百年实践中总结得出的宝贵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乡村意识形态建构的百年历程中取得了辉煌成就,为开展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意识形态建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之际,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伟大实践中不断推进乡村意识形态建构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走下去,必将继续谱写新时代乡村意识形态建构工作更辉煌的篇章。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2] 韩鹏云,刘祖云.农村基层政治合法性建构与乡村秩序重塑[J].江汉论坛,2014(10):38-41.
- [3] 黄家亮.中国乡村秩序的百年变迁与治理转型——以纠纷解决机制为中心的讨论[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6):147-154.
- [4] 贾钢涛,秦燕.大革命时期中共农民教育思想略探[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2):136-139.
- [5] 陈娅飞.形塑新社会的“主人”: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乡村构建[J].湖北社会科学,2020(6):18-25.
- [6] 李江波,姚亚平,黎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构[J].求实,2017(8):21-31.
- [7] 刘燕,任旺.新时代乡村意识形态建设的旨趣追求[J].理论导刊,2019(10):85-90.
- [8] 薛金艳,程舒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建[J].社会科学战线,2013(6):170-174.
- [9]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0] 廖义军.试论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及意义[J].湖湘论坛,2016(2):26-30.
- [11]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17] 雷家军.习近平农村文化建设思想论析[J].中华文化论坛,2018(3):60-71.
- [1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19]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8-02-05(1).
- [20] 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21]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 [22]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
- [23] 张海荣.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文化治理的逻辑演进[J].人民论坛,2021(10):72-75.
- [24] 王永华,钟以瑞.红色歌谣运动与革命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2):12-23.

[责任编辑:李思远,黄燕]

The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and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Ideolog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YANG Li, GENG Xianbing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ideology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CPC's rural work. It is a political process in which the legitimacy of the CPC's governance is gradually recognized by the rural peopl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PC's rural ideology has gone through such stages as gestation and opening, tortuous exploration, restoration and adjustment,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Summarizing the 100-year experience of the CPC's leadership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ideology, and explaining profoundly the basic principles, central issues,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s, value stances, internal requirements and effective way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ideology, it would be useful for constructing a more value-oriented and reality-targeted rural ideology and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rxism; rural society;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historical experience